



新华社客户端



一曲壮丽的钢铁史诗

鞍钢与共和国风雨同行七十载实录

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。

70年前，她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开工，挺起国家建设的钢铁脊梁，点燃了举国上下摆脱一穷二白的希望。

共和国的经济成长在这里见证。

70年间，她在百折不回中沧桑巨变，折射出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的不懈追求。

从全国支援鞍钢复工，到鞍钢支援全国建设；从改革开放后奋起直追，到新时代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。翻开这个共和国“工业巨人”的奋斗长卷，那里有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，蕴藏着国家持续向前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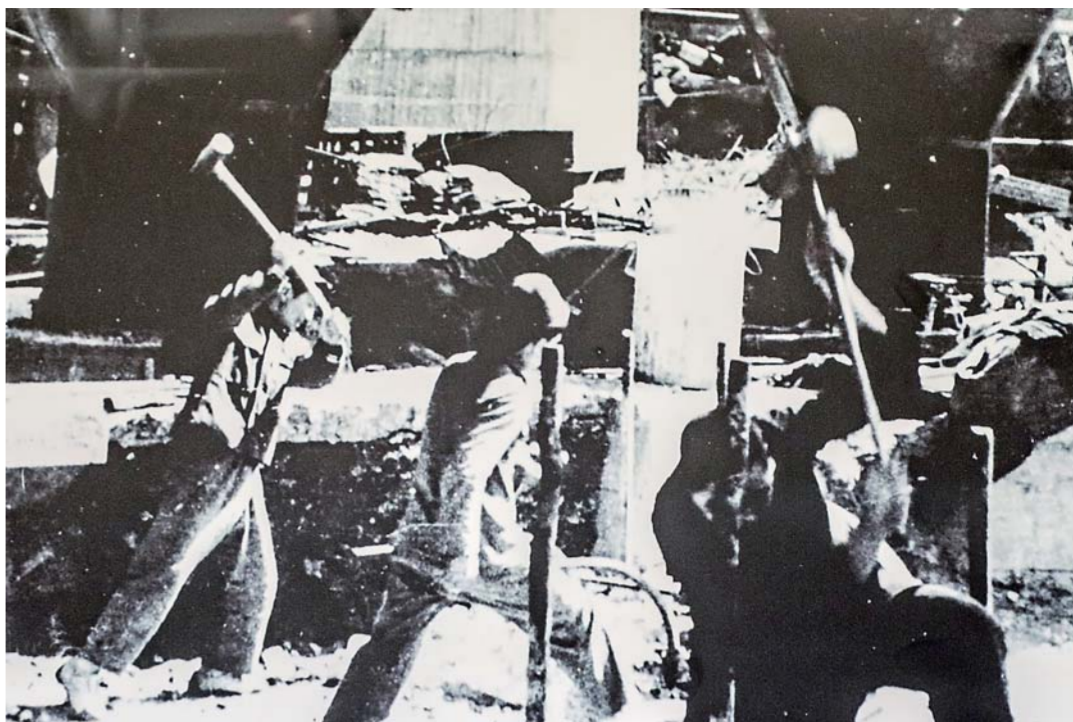
**在一片废墟中快速站起，
为了祖国发展需要，为了人民
当家做主**

如今钢铁产能接近4000万吨，跻身世界500强的巨型“钢铁航母”，70年前，是在一片废墟中起航。

1948年11月，东北全境解放。



▲7月5日，工人在鞍钢集团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四号高炉进行生产工作。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



▲7月4日，鞍钢集团博物馆内展示出的1949年工人修复工厂的照片（翻拍照片）。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

1个月后，当40岁的李大璋带着中共东北局调令，一脚踏进鞍钢厂区，被这里的破败震惊了。

“铁水凝固在高炉里，厂房内设备残缺。”李大璋的儿子李晓东，至今还能体会父亲担任鞍山钢铁公司首任经理的艰难。当时，国内年产钢不足10万吨，还不够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。

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，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复工。恢复高炉的材料、工具极度匮乏，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，带领工友刨开冰雪，搜集机器零件。高炉修复时，他吃饭、睡觉都在厂里。

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，少年时逃过荒，青年时为日本人背过煤，挨打、挨饿是常事，半辈子漂泊不定。当解放军开进鞍山，工人们当家做主，年过50的他才找到了“家”。

“跟共产党走，棒打不回头！”——孟泰一句话，戳中了工友们的心。厂里发动工人们献交器材，数千职工肩扛、手挑、车推，络绎不绝，队伍从厂区一直排到几里开外。

短短半年多，这里就炼出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。1949年7月9日，鞍山钢铁公司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专门送来贺电，勉励鞍钢“为工业中国而奋斗”。

曾断言这片钢厂废墟上“只能种高粱”的日本专家感慨，从来都是个人往家里拿东西，哪有给厂子送东西的，“共产党了不起！”

当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，工业化就成为新中国的必然追求，而钢铁工业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“地基”。

1950年初，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。近两万名干部、技术人员、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，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。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，人们形象地称为“500罗汉”。

今年91岁的谭福润就是“500罗汉”之一。

“我当时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，办公地点毗邻西湖，景色宜人。谁都知道，工业战线劳动强度大，工作环境差。”

参加过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的老人说，“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，还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”

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众人能移万座山。“一五”期间，鞍钢产量很快就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，每年生产的钢、铁、钢材均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。1953年12月，鞍钢“三大工程”——无缝钢管厂、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竣工投产。毛主席专门发来贺信，称赞这是“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”。

“短短几年，鞍钢就从一片废墟中站了起来，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起步。”鞍钢退休干部许家强说，这是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胜利，也向全国传递了信心和力量。

“全国支援鞍钢复工”带来的就是“鞍钢支援全国建设”。一座座钢铁基地在各地拔地而起，新中国工业家底日渐丰厚。

1964年，国家启动“三线建设”，指定鞍钢包建贵州水钢。今年93岁的杜洪文就是援建者之一。在鞍钢机修厂工作的他，撇下妻子和三个女儿，一去就是15年。

当年报名时，老人第一个举手：“毛主席说，三线建设不好，我睡不着觉。去水钢，光荣！”

光荣背后是付出。杜洪文的大女儿杜丽娜清楚记得，那些年母亲安顿姐妹三人睡下，常常打亮手电筒，反复看父亲写满思念的来信，整个被窝都跟着母亲的抽泣而抖动……

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.5万名，援建了包钢、武钢、攀钢、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。“鞍钢就像老母鸡，下蛋下到全中国。”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。

**在自力更生中奋发图强，
为了市场需要，为了永立潮头**

当国家开始破除一统到底的计划体制，“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”感受到了压力。

经过30年超负荷运转，鞍钢露出疲

态：炼铁高炉经常被“开膛破肚”，屡次大修；炼钢平炉黑烟滚滚，熏得人喘不过气来……

“一五”时期，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“万能工具胎”，将生产效率提高6至7倍，他一年完成4年多的工作量，被誉为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”。

这之后，鞍钢放手发动群众，其鼓励干部参加劳动、工人参加管理，改革企业中不合理规章制度等做法，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。1960年3月22日，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：“……鞍钢宪法在远东，在中国出现了。”“由鞍钢人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，在全国工业企业大面积推广。”

改革开放之初，国家无力对老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改造。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国家资金紧，我们自己筹；买不起新设备，就买旧的。”回忆那段艰难岁月，鞍钢人掷地有声。

当时，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厚板厂。鞍钢看准时机，向职工集资1.2亿元，建起了二手生产线。正是这种独有的胆识和眼光，成就了企业最赚钱的项目。

新一届鞍钢领导班子走上台。刚上任的鞍钢总经理刘介彛急了——“再不改造，鞍钢就成一堆废铜烂铁了！”

发韧于“九五”时期的大规模技术改造，给鞍钢带来了转机。在一缺资金、二稳产量的倒逼之下，鞍钢技改以我为主，努力做到“高起点、少投入、快产出、高效益”，为一批国有老企业改造提升探出了新路。

“别人全套引进海外装备，我们只购买关键部件，能自己动手的，决不依赖外方。”曾经担任鞍钢技术改造部部长的王明仁说，仅一条1780热连轧生产线，我们就省了近40亿元，创造了同类项目工期最短、总投资最低两个“行业第一”。

改造东部老厂，兴建西部新区，在渤海湾畔建设世界先进的精品钢基地……进入21世纪，老鞍钢脱胎换骨，旧貌换新颜，回应了市场对装备技术、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。

气馁，不服输，鞍钢人又一次站在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潮头。

每座红军桥都有一个故事

壮丽70年·奋斗新时代
记者再走长征路

「我们都把他们当亲人」

记贵州遵义八卦村的红军墓守护人



派人拆桥。当地民众又连夜把桥修好。红军大部队听说这件事，很感动，派兵上山伐木，重建并加固桥梁。就这样，同仁村有了一座红军桥。

98岁的村民赵旺财说：“当时我们住在乌岭背附近，我爷爷和父亲还帮先遣部队带过路。奶奶告诉我，红军从我们家门前路过，在门外生火煮饭，还请她一起吃饭。”

20世纪70年代，由于道路硬化需要，木质的红军桥要改建为水泥桥。当地共产党员、基干民兵与瑶族村民又一次共同修桥。这座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红军桥，让瑶族同胞世代铭记。

1934年10月，在江西，红九军团抵达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绵江时，简易的小木桥无法满足1万多人马过桥所需。

这时，百姓主动送来门板、床板，几乎把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拿来搭建浮桥。部队开始渡河，村里小伙子分成十几个组，每组两人，扛起木板，用身体支撑桥墩，以保证桥面更稳固。这是一座用木板、门板和血肉之躯搭建起的红军渡桥。

1934年11月，在广西，湘江界首渡口群众帮助红军用小船和木板搭建浮桥，红军主力凭借这座浮桥抢渡湘江。搭桥时木板不够用，红军借用当地群众家的门板时，在门板上都编好号，归还时丝毫不差。

1935年1月，在贵州，红军西渡赤水河，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，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，经过一夜努力，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，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。

1935年3月，在四川，红军与当地百姓建了一个造船厂，1个月内造出70

多艘木船和3座竹扎浮桥，军民肩扛手抬这些船和桥，夜走山路运至嘉陵江边。

……这一座座红军桥，体现了工农红军与各族人民风雨同舟、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，这是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
而今，在贵州省瓮安县，当年红军抢渡乌江的峡谷上，建起了一座江界河大桥，至水面高度263米，主孔跨越330米，气势巍峨。

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介绍这座大桥时说：“长期以来，这里山多水众，交通不便，这是百姓贫困的重要原因。我们修路建桥，归根结底是为了造福百姓，帮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，实现新长征的目标。”（记者张瑞杰、李黔渝、朱超、齐健）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

新华社贵阳7月9日电（记者李惊亚）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镇八卦村胜利组，距离村民徐乾坤家门口20多米，有五座无名红军墓。清明节和中元节，徐乾坤和其他村民上坟时，都要给这五座红军墓烧纸、上香。

“这几座红军墓在旁边，就像我的邻居一样。不止我一家，全村人都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。”徐乾坤说。

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八卦村，据遵义市党史部门介绍，1935年初，红军离开遵义，经过八卦村北上，抵达巷口镇凉水沟、倒座石一带，遇到碉堡中的黔军阻击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，红军最终消灭守敌，确保了大部队通过。

因为急于行军，只能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。

这些年来，当地村民自发维护红军坟，逢年过节给烈士扫墓。

2016年，红花岗区民政局下发文件，决定将辖区内零星的红军坟集中迁葬于深溪镇的南山公墓内。八卦村村民听说此事后反应强烈，始终不同意把坟搬走。

“为了红军坟的事，村党员代表、人大代表、群众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两次，去镇里开会一次，区民政局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，全村老老少

少100多人自发参加，都不愿意把红军坟搬走。”八卦村村支书舒中银说。

70岁的村民郑舟模说，虽然不知道这些牺牲的红军烈士来自哪里、姓甚名谁，但他们是老百姓翻身求解放而牺牲的，长眠在这里，大家一直把他们当亲人，“我们希望在他们流血牺牲的这片土地上，世代守护他们。”

当年，红军牺牲后被就地掩埋，比较分散，安葬环境也较为简陋。

村里开会商量怎么办的时候，老党员徐乾述主动提出，无偿捐献自家一亩多的土地，“我是农民，靠种田吃饭，家里的田土也不多，但我想，没有红军战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，作为共产党员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巷口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徐瑞说，看到当地村民对红军的感情如此深厚，区民政局最终决定，只迁葬部分红军遗骸，其余的留在八卦村，村民们在徐乾述捐赠的土地上修建了五座墓，将分散的红军尸骨集中起来迁葬于此。

记者在八卦村看到，这五座红军墓背靠青山，坐南朝北，并非而立，圆头鱼尾，毛石垒筑，规整统一。墓高约1米、宽约1.3米，每座墓前均有大小相等的石质墓碑，碑正中镌刻“红军烈士之墓”，右刻“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战牺牲”，左刻“遵义市武装部立”的字样。

80多年过去，如今的八卦村物阜民丰，风景怡人，山上的确堡遗址、山下的红军墓默默矗立，记录着不被忘却的历史。